

中华文化学院文库

文化与寻根

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华侨学者论中华文化

■ 蔡福金 / 主编

开明出版社

Kai Ming Press

目 录

中华文化的崇高地位与永恒价值	汪忠长 (1)
中国现代化方向之探讨	曾宗伟 (4)
中华传统文化与科技现代化: 儒家思想回应	
西方科技文化挑战的历史个案	叶国洪 (12)
21 世纪中国人的生活	林至洁 (38)
华人华侨与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管必红 (50)
中华文化是我生命之本	黄企之 (57)
团结华人 放眼世界	杨照海 (66)
华商在美地位的提升及在未来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	吕家骧 (71)
近 30 年来的美籍华人概况	沈己尧 (77)
北美的中文教学前景不凡	沙 蒙 (82)
中华文化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	郑其贤 (89)
中西文化与中西新闻意理之异同	李茂政 (97)
“一国两制”与中华民族的前途	王中平 (114)
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折射	汪立峡 (121)
“台湾意识”与文化认同	林深靖 (126)
21 世纪中国文化价值的意义	吴琼恩 (130)
中华民族腾飞中之逆流	姜思章 (145)
文化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之复兴	印铁林 (155)
编 后	(165)

中华文化的崇高地位与永恒价值

汪忠长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她发源于中华民族，产生于中华国土，故有其独特性与永恒性。其气势之宏伟，其历史之悠久，实举世无双，光芒万丈，在世界各种文化中，占有卓越之地位。

文化之与国家，犹如人之精神与躯体，有躯体如无精神，则如行尸走肉；有精神如无躯体，则精神无所寄托与发挥；二者不可或缺，更不可分割。故中华民族之存亡，实系于中华文化之发扬，此点不可忽视。身为世纪交替之炎黄子孙，必须具有两种认知：

1. 恢复民族固有之智能，以迎头赶上世界之新知，不可抱残守缺，必须创新与改革。
2. 恢复民族固有之道德，以彻底凝聚国家之力量，不可各执己见，必须协商与合作。

中华文化之特征

一、中华文化生命之悠久

言世界文化，咸知古代人类，由野蛮而进入文明。有所谓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与我中华文化。惟所谓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及印度文化久已失去其独特性与承传性，而为希腊

文化、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所取代。中古时代欧洲经过所谓“黑暗时代”而进入“文艺复兴”，即由神权独占之文化，而进入理性时代之文化。至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扩展于欧美，且侵入亚非大洋洲；独我中华文化则不然，溯自黄帝尧舜禹汤文武，至孔子综其大成，巍巍赫赫，历数千年而连续无间，此实为文化史上绝无仅有之现象。

二、中华文化气象之宏图

中华文化孕发于中华民族，产生于中华国土，拥有世界上十二分之一之土地，占有世界上五分之一之人口。中华文化素以亲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为理想，境内各民族平等无别，和谐相处，彼此之间，既不欲奴役人，亦不欲为奴役。忠恕之道行，故能容其异而成其大，中华民族生存之理想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其最终之目的在“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此又为何等宏阔之气象。

三、中华文化内容之丰富

我中华民族之国境以内，有山岳，有高原，有沙漠，有盆地，有树林，有平野，有低湿，有河川，有沼泽，有海洋，有岛屿，各种地形，无不具备。而气候则严寒、酷热皆有之，亦可谓各种气候无不具备。由于自然环境之复杂多变，为适应生存，故亦能孕育成内容丰富多姿之文化。我中华文化特重人道之探索，故中华文化以“人伦”为主。《易传·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可见先民之探索人道以“人伦之体认”为先。故中华文化注重“五伦”、“十义”，以及“四维”、“八德”。

四、中华文化精神之高卓

我中华文化基于上述，故特重“人伦之体认”、“人性之追

究”、“人品之敦励”、“人生之升华”、“人格之陶冶”、“人心之研寻”，一言以蔽之曰：“人文精神。”析而言之，则有三：一曰“中”，二曰“诚”，三曰“仁”。

《论语·尧曰》云：“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故“中庸”为一切之本，而以“诚”心以行“仁”。此为中华文化之核心所在。

结 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故中华文化有其崇高之地位及其永恒之价值，身为炎黄子孙必须发扬光大，而中华民族必须团结合作，以迎接 21 世纪之飞腾发展。

中国现代化方向之探讨

曾宗伟

前 言

事物的发展总是辩证的。比如瘦人吃了开胃药，食量大增，开始长胖，可是继续吃药，越来越胖，终于得了糖尿病。因此，凡事都得有“生命周期”、“系统工程”的观念，慎始顾终，时刻把握方向才行。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现代化长征以来，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其中得失成败、经验教训，应该足以总结了，将来要建立成一个怎样的现代化社会，也应该有个蓝图了。

也许人们要说，现代化就是现代化，还有什么方向问题呢？美国和日本都是现代化的国家。可是东京的交通，是四通八达的地铁，而洛杉矶的交通，则全靠私家汽车。同样，中国和美国都是医学很先进的国家，然而，美国治心脏病是一流的（心脏病是有钱人的病），而中国在断肢再植和大面积烧伤方面是一流的（这两种伤多是工人才会遇到）。所以说，一样是现代化，仍然有方向的差别。进而言之，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残酷的原始积累、掠夺落后地区的资源（不论用暴力或“合法”的方式）、贫富极度不均、环境严重破坏、人心趋于自私、价值普遍拜物（以至于笑贫不笑娼）……这些问题归根结底，乃缘于“私字当头”。所以说现代化还是有个方向问题。相信亿万同

胞和我一样都在默默地关心着这个问题，我不揣孤陋，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教于诸位。

一、已发展国家的困境

我们首先来看看世界上先进国家存在些什么问题。以美国为例，美国一家著名电视台，曾经针对美国的经济长期不景气，归纳出三点原因：

（一）外国货的竞争。美国是个市场高度开放的国家，又由于美元是世界的通货，各国都削价把货物销到美国来赚取美元。这使得美国一般生产业无法生存（除了高精尖的以外），工厂纷纷关闭，导致失业率渐高，购买力渐低，市场日益萧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结果是各国更加激烈地竞争美国市场，有的大搞“流血输出”，大家都觉得美国生意不好做。可见，靠便宜货挣美元不是个方向）。

（二）资金外流。除了进口货便宜之外，美国的工资也太高（单说美国整个社会的设计，使人们住平房、开汽车，工资就低不下来），美国资本家纷纷到低工资的国家、地区去投资。这当然也导致本国的失业率渐高，购买力渐低，市场萧条（反过来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当工资和生活费节节提高之后，外资、内资都将转投它地。台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学家预测，10年之内亚洲的经济成长便会减缓。这就在告诉我们资本家哪里能赚钱就到哪里去，资产阶级取诸社会并不会还诸社会的，生产资料不公有，生产成果是保不住的）。

美国资金外流的结果，除了造成失业外，也使得它无法限制进口。例如，日本三家主要汽车厂的股份，30%到60%是美国资本。美国若限制汽车进口，便会损伤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美国的政权是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因此而无

法遏止。美国原来设想以高科技产品的超额利润来弥补中低档货的进口逆差。但是美国高科技领先的领域，正在日渐缩小。这样，美国的生产业，就普遍难以为继，失业率就日益增高，购买力就日益下降。

（三）高度自动化。由于微电子技术的飞跃进步，电脑的普遍采用，使得各个领域高度自动化。这正在大面积、快速度地消灭着人们的工作机会，更进一步使得失业率渐高，购买力渐低，市场萧条。

以上三点很精要地描绘了美国由盛而衰，以至于长期不振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贫富悬殊加速扩大。美国长期以来为了减缓两极分化的速度，曾采取了累进税法，最高可以课税达 65%。并订有反托拉斯法，以限制大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地域，防止大公司吞并一切。可是 1980 年里根执政之后，把最高课税率改为 33%，并把反托拉斯法做了松动的修改。税率的平抑使得贫富迅速拉开。君不见美国总统候选人培洛特家财 220 亿美元，而仅洛杉矶一地，无家可归、夜睡街头者便达七八万之多。人们普遍加速趋于贫困。而反托拉斯法的松动，使得近年来企业兼并盛行（兼并通常就会裁员）。“贫下中农”简直就没活路了（反顾中国，两极化现象，也是“一日千里”，企业兼并也是迟早的事）。

（二）泡沫经济的虚幻膨胀。20 世纪 70、80 年代各国赚饱了美元的有钱人，纷纷在美国大炒地皮楼宅，房地产价格每月一涨，信用日日膨胀。加上以前苏联为假想强敌，政府军费惊人透支（例如，1988 年军费达 4700 亿美元）。一时间百业兴旺，产销两畅。可是泡沫毕竟是脆弱的，是不可能无限膨胀的。房地产终于价不当值，在 1990 年栽了下来，造成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周转严重不灵（中国也曾有大量银行资金冻结在房地产上），百业倒闭的倒闭。而政府的透支，更导致联邦负债达 40000 亿美元之巨（现在已达

50000 亿美元)。现时，美国联邦的每年税收，15%用于偿还赤字利息，这造成了“美国万税”，人民不堪负荷。

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也都有类似的问题。例如日本，以前大学生还没毕业，工作早就定好了。而今，毕业后平均要发出 50 封求职信，才会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其他如金融风暴、经济萧条、治安日下、风气败坏……更是不一而足。

从历史上看，各国资本主义的初期，总是显得处处机会，生机盎然的。然而，自由公平（如果真有的话）竞争总会有优胜劣败。胜者赚而败者亏，几个回合下来，贫富就拉开了。拉开日远，则竞争也就不再自由公平了，胜者越富，富者越胜，最后生产资料全集中在少数资产阶级的手里，而大多数人也就成了无产阶级。这是规律。这种两极化规律，在今天自动化、生产力、生产规模无比扩大的年代，更是大面积、快速度的在进行。设想，有一天各个经济领域都自动化了，到处使用机器人，连机器人也是机器人自己制造的。那么人类应该是很幸福的了？不会的。因为现在的生产关系是“不工作不给钱”，都自动化，哪有工作？没工作哪来钱？没钱哪有购买力？市场哪能不萧条？市场萧条了，那么最后连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也不想生产了。这样就形成了“霸着茅坑不拉屎”的状况。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极度矛盾”，它已近在眼前。要解决上述的问题，如果不采取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办法，那只能请资本家的生产不要以赚钱为目的了。然而后者无异与虎谋皮，所以也只有前面那个办法了。

二、中国公有制的问题

中国曾经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达 30 多年之久。有人说成绩大大的，有人说失败了。到底公有制在中国的实践成败如何？我的看法是，30 年的公有制大有成绩，然而也常犯错误，有时还相当

严重。

首先，中国是在公有制的日益壮大之下，顶住列强的打压封锁，并日益强大起来的。其次，中国的工业是在公有制之下，建立起基本上成龙配套的完整体系的（汽车的制造，原子弹的试爆成功，卫星上天，石油、煤炭、钢铁的大量增产……无一是我们能否认的成绩）。其三，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惟一一次长期享受到不用为明天发愁，生老病死都有保障的日子，也是在公有制之下曾经拥有的。

在建国 30 年中的国内外条件下，中国能养活成倍增长的人口，这与计划经济、土地国有、高度合作化、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年长期的农田基本建设，后来的农业改革是不会有成绩的。我曾在 1987 年参观福建的乌潭水库。原来晋江从乌潭水库的山区，流经泉州，便直接泻入海中。由于公有制，全国一盘棋，所以毫无阻力地就能兴建水库，把晋江上游堵起来，把水引到惠安地区，灌溉了 20 万亩地。记得当时带我参观的干部对我说，当年修水库的时候，他们都参加了义务劳动。而现在，您看（他指着水渠渗漏的地方），不给钱就没人修了。

然而，在资产阶级列强的强压下，急于求成，易犯极“左”的错误（例如，怀疑一切，盲目而非批判地“除四旧”，大跃进的“万斤亩”，以及后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连理发店都是国有的等等）。在整个民族文化水平甚低的情况下，共产党的民主集中搞成了“一言堂”，在经济水平极低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搞成了“大锅饭”。极“左”，打击了一大片，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又造成冒进失败；一言堂，压制了民主，瞎指挥，导致无谓的损失；大锅饭，破坏了责任制，干不干两斤半，养了懒汉，使得经济发展没有动力。这种情形，据报道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达到严重的地步。

三、改革开放

为了“拨乱反正”，改变极“左”路线，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大锅饭”、“一言堂”被加以猛烈批判，被认为是生产力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取而代之的是解散公社，“联产承包”、“包产到户”以及后来的工商业的承包制、私有制……企图从所有权（起初只是其中的使用权和支配权）的分割打散来打破大锅饭，贯彻责任制；从经济的不集中来打破权力的集中，消灭“一言堂”。更企图通过激发人们的利益追求，来带动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改革开放所采取的办法，在克服极“左”路线的深重恶果上，不失为是一种办法。在当时根深蒂固的极“左”状态下，也许是惟一的办法。成绩到今天也还是大大的，是主要面。这方面的报道很多，我在此不用重述了。我想强调的是，向右转可不能一直走下去。我们已经有了“糖尿病”的征兆了，虽然我们的身子还不怎么胖。

经济学家都清楚，资本主义是无法天长地久的（简单地说，它不是一种“动态平衡”，所以不能长久）。而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何走，人类又没有经验。中国好不容易搭起了社会主义的框架，也取得了不少经验。后继者实在应该修改完善之，而不是将框架摧毁丢弃之。改革开放之初也是这样说的。当时说，“因地制宜”；又说“为了补充计划经济的不足，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允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承包制只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改革公有制的弊病（大锅饭、“一言堂”），也未必需要抛弃公有制。头痛岂可砍脖？一时的权宜办法，不可视为方向。

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

统计资料显示，中国 1994 年全国总储蓄额是 13 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约 1 万元人民币。然而，这 13 万亿元的 80%（也就是 104000 亿元）却集中在 2% 的人（约 2500 万人）的户头上，也就是这些“大款”，平均每人有存款 400 万元人民币。而其余 12 亿同胞，平均每人约有存款 2000 元人民币。然而，“平均数”有意义吗？我和培洛特的平均财产是 110 亿美元，但他的财产是 220 亿，而我的却是零。中国尚有数千万工人，每月收入仅 61 元人民币，数千万农民年收入仅 300 多元人民币（1994 年统计）。贫富悬殊还在扩大，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个国家有多大程度是社会主义，取决于该国家生产资料有多大比例是公有的，分配有多大程度是按劳的。姓“社”与否，就看大部分重要的生产资料是不是公有（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以及经济生活和其所决定的上层建筑有多大程度的民主（也就是说社会的剩余价值的支配、使用，谁主沉浮）。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界定。根据国内自己的调查，中国的国有资产，正以每天 1 亿元人民币的速度，转变成为私营企业的资产（大部分成为私人的原始积累）。这种大水冲倒龙王庙的现象，是由于某些政策不明确所引起的，对此我们应高度重视。

当然，改革开放要和世界各国来往，如果制度太不一样，就无法来往，其实这并不难。本来私人企业、外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作为补充计划经济不足而被允许存在的。从整体的资源、人力、市场拨出一定比例，作为它们的活动天地即可（就连美国的内华达州的土地，也只有 14% 是私有的，可地产商已经炒得够欢的了）。断断不能使之与你平起平坐、并驾齐驱，直至将你的锅端走。你如果去查看现今的国家总产值、商业销售额、进出

口额、公营私营企业家数（及雇用人数）等等的公私比例及其趋势，你就会触目惊心，令人担忧。

是到了警醒的时候了。为今之计，不是不要私营，不要外资，而是要大力扶植、整顿、搞活公有企业，从技术、财务（包括银行贷款）、税制、管理、市场资讯、研发，乃至福利（应以福利保险来减轻企业包袱）、保障（但不能养闲汉、懒汉）等各方面下手，使之胜过私营及外资企业。务使大多数的人们，多方衡量之后，得到“公家机关、企业还是比较好”的结论。这样才能留得住人才（中兴之机在于人才），才能稳得住人心。有人说：“公营就搞不好”，这是一种“迷思”。国内外搞得好的公营事业例子很多。请不要把管理范畴的问题和制度的内在矛盾（如资本主义必然两极分化）混为一谈。关键是下不下决心。我常感叹，开放以来，进口汽车一半的钱，甚至四分之一的钱，早就可以搞成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厂了，何至于“上海牌汽车靠边站”？搞好公营企业，已经是刻不容缓的课题了。

五、其他问题

所有制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套句术语说，它是“阶级斗争”的根本争执点。它是纲，纲举则目张。确保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也就确保了我国的红色江山。

其他如，生活水平与全国资源的相适应，环保和发展，“租船和造船”，引进和有机消化，恰当的贫富差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教育的提高和普及，权力私有化与中国特色的民主，新闻自由与界线，以及在前言里所提到的种种，当然都是现代化方向所涉及的问题。然而，由于我学识有限，就留待别人来谈吧。

中华传统文化与科技现代化： 儒家思想回应西方科技 文化挑战的历史个案

叶国洪

以孔子思想为主流的儒家思想，在自 19 世纪末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备受部分思想激进分子的怀疑、揶揄甚而全盘否定，在近代历史上萌芽于清末民初，而盛行于“五四”运动，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更高潮迭起。然而，儒家思想屡经历史严酷的考验，百折不挠，体制改革仍屹立不倒，足见儒家思想于中华民族历史上，地位超然。

若寻根究底，当溯自先秦，若探索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的关系，则须对西方文化冲击儒家思想的历史作出纵深式回顾。而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方面承继和发展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对回应西方文化冲击及中华现代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故本文拟就此作为历史个案，进一步探讨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

自 19 世纪末西方列强一方面将机械及机械制品向中国倾销；另一方面向中国蚕食鲸吞，掠夺资源，导致中国国势日蹙。清廷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容许部分开明疆吏推动洋务革新，然而保守派与革新派知识分子就文化融合与创新问题争论不休，加上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步伐躁进争激，使模仿西政、西艺的自强运动，陷入徘徊于保守与变革两个极端之间的漩涡之中。

正当失衡跌宕之际，张之洞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力主综

合各方舆论，取长补短，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以折衷新旧，融合东西文化而不扰乱固有伦常，在当时形势危殆之秋而言，不失为补弊起废、曲折地继续改革的权宜良策。

当时的推行西化，也就是中国学者所依循的近代化的道路。就晚清这 70 年间来说，儒家传统思想提供了近代化的基本动力，供给知识分子以接受现代化的道德勇气与理论基础。当时学者根据儒家固有观念择善而从并承认开放革新的必要，从而启蒙国人以现代化观念，并提出儒学为本去掌握及善用西方知识，以创立具有中国儒家思想特色的现代化理论。诚然西方文化提供了启发的触媒，儒学的新内容亦反映清末改革家（以张之洞为个案）思想回应西方文化冲击的潜在深层转变：儒家传统核心思想并不构成对外来思想盲目排拒的根本因素。其次，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观念在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上并无严重冲突，事实上晚清学者是借着儒家学说而展开近代化运动的。最后，儒家思想被清末改革知识分子用作融合、吸纳及修正西方思想的原始基础，且藉儒家学说去充实他们的新理论并用作行动指南。

张氏按“中体西用”原则，力保国体国权，同时借用外国技术和资金，以推动工商业现代化，同时发展科学以育专才，以推动教育现代化，为 20 世纪中西文化的融合和创新奠定了不可或缺之社会政治及经济基础。因此，儒家思想在清末改革运动中仍起着重要的主导力量。近人贬视“中学（儒家思想）为体，西学为用”理论和策略为迂腐保守的落伍败笔的看法，实有重新审视与评价的必要。

一、对西方文化迂腐保守挑战的回应， 折衷新旧，融合东西文化而不扰乱固有伦常

不少史学家批评中国在迈向现代化期间（19 世纪末叶），“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提出不彻底的西化路向，产生“体”与“用”的矛盾，导致思想上混淆与冲激，因而阻碍了现代化进程。这种流行的说法虽反映部分真实，但流于表面观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若要全面考察早期现代化的得失，必须将当时中国应付西方挑战的主流思想作深入的分析。

中国史学家若不深切反省早期现代化运动中挫败的深层因素而轻率地找“中体西用”论作为事败的替罪羔羊，则现时推行如火如荼的经济现代化运动仍有重蹈覆辙的危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张之洞振兴工业的基础理念。梁启超论述清代学术，给予“中体西用”以时代观念的历史地位，称其“举国以为至言”。意指梁氏所见所闻当时潮流的概念，并非指张之洞为惟一代表，不过张氏确为领导这一思潮的代表者，亦可视为中心人物。当然，“中体西用”论成为晚清学术思潮的一种共同观念，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①

从“中体西用”论的时代特征来看，它无疑具有固本、变通、自强、御侮的自强救亡性质。从《劝学篇》外篇的篇目如“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度译”、“阅报”、“变科学”、“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及其内容来看，张之洞对“西学为用”和“中学为体”的态度同样开明和坚定。张之洞透过“中体西用”论对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自强运动，从概念上赋予了基础的理论和肯定，并指出未来方向。早在1860年，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事业后，“中体西用”就成为自强改革者的基本方针，并进而成为整个自强运动的总体战略思想脉络。如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

^① 参阅王尔敏：《清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论》及《张之洞与晚清中西调和之思想》，载《晚清政治思想论》，台北，1980年，第51～71页，第72～100页。

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①李鸿章阐述得更为清楚：“中国文化制度迥异外洋獠狃之俗，所以郅治国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②于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动机与仿西智、西械的实践融合在一起，筹建造船厂，枪炮厂，为“中体西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验。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以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在甲午战争之后凝聚而成，正值曾、左、李三人推展的自强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后，张氏毫不气馁，虽然陷于冷嘲热讽的低潮中，仍不屈不挠地支援自强运动和振兴工业的事业。此外，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适推广于甲午惨败后的唾骂声中，^③刚好为自强运动的改革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并带动振兴工业运动勇闯另一新高峰。

晚清流行的“中体西用”思想有若干层次：倾向于吸收西学而充实中学，取于人而不失自我，非惟在求中西融合，且在同化“西学”以为“中学”。另一结构是分内外两层次：“内”则坚固根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第14页。

② 李鸿章：“同治四年八月初一奏折”，载《洋务运动（四）》，第10页；参见姜铎：《中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载黄逸烽、姜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第66页。姜铎谓李鸿章是“中体西用”思想的身体力行者。

③ 晚清学人调和中西学术的言论，也就是把中西学等量齐观，探求两者之精义，比较二者之长短，以为取资，并使之融合为一种更具价值的新学。当时言论的趋势，倾向于吸收西学而充实中学，取于人而不失自我。光绪二十四年（1890）都察院都事长庆说：“说者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学有本末，不容越俎，要在先中后西，方为通体远用之才，否则中学未通欲讲西学，是犹南辕而北辙，舍本而求末也。”（《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11页）长庆此说，可代表当时学者普遍的意见，相同者甚多。总结此学说，其口号虽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主旨则仍以自我为中心，乃在用西学扩充中学的内容，增大中学的分量。